

体认视域下量词“把”的词义演变研究

廖巧云¹ 李蕊秀²

(1.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研究院, 上海 201620; 2.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本研究结合 CCL 语料库分别对“把”的集合量词、个体量词和动量词这三种形式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历时分析发现,量词“把”的这三种形式在出现时间和计量对象方面都有所差异,而它们的计量对象都在不断增加和抽象化。我们进一步从体认视角分析发现,主客体间的多重互动贯穿于量词“把”的意义和概念的整个生成过程,从而使“把”完成了“动词义 & 名词义→集合量词义”“动词义→名词义→个体量词义(有柄事物)”“动词义→个体量词义(无柄事物)”和“动词义→动量词义”的词义转变过程。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体认的多重互动作用下,认知主体基于反映相邻性的转喻机制实现了量词“把”的生成及其计量对象的抽象化。本文能为基于体认观研究词义演变提供参考,并能为汉语外语教学提供指导。

关键词:量词“把”;体认的多重互动;转喻机制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1-0020-11

0 引言

量词是汉藏语系区别于印欧语的一大特点,张志公将其定义为“表示事物或动作计算的单位”(1956:146)。关于量词的研究由来已久,有研究其定义、分类和功能的(Aikhenvald, 2000; Cheng et al., 2005; Craig, 1992; Zhang, 2007; 邢福义, 1991),有探讨其渊源及发展过程的(步连增, 2011; 高亚楠等, 2018),也有探讨个别量词的演变过程和机制的(陈香兰等, 2018; 王艳滨, 2016)。

近年来,量词“把”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根据词典对“把”字的释义可知,其词性丰富,且量词“把”的计量范围广泛。《新华汉语词典》等对“把”字的解释为:作动词,含握住、把持、看守等义;作介词,表示处置、致使、动作的处所或范围等;作量词,用于表示具体或抽象事物以及动作;作名词,表示柄或是被扎成一捆的东西;作助词,表示概数。据《汉语量词大词典》可知,“把”字作为量词时,可充当集合量词、个体量词和动量词,并且计量的事物也从具体延伸到抽象。

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将“把”视为动词,认为“把,握也。从手,巴声。”且在多部词典中,动词义被看作“把”的第一义项。因此,“把”的动词义被视为其本义,而其他义项则被认为是基于其本义即“用手握住”所衍生出来的。综上所述,作为常用量词的“把”及其计量对象似乎也有相应的演变

收稿日期:2022-10-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英语义修辞的文化对比研究”(19AYY011)、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汉外语义修辞话语识解的文化机制对比研究”(2018114027)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廖巧云,女,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认知神经语言学及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

李蕊秀,女,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及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引用格式:廖巧云,李蕊秀. 体认视域下量词“把”的词义演变研究[J]. 外国语文, 2023(1): 20-30.

轨迹。

与量词“把”相关的已有研究既包括对其演变进程的研究,也包括对其语义概念化过程的研究。如:金桂桃(2007)和李春梅(2012)分别发现“把”的名量词和动量词形式的出现时期各有不同;宗守云(2009)结合范畴化理论探讨了集合量词“把”的计量对象的变化;牛保义(2010)则从心智模拟概念化角度分析了量词“把”的语义概念化过程。这些研究虽分别分析了“把”字个别量词义的演变过程和认知机制,但鲜有研究结合语料库方法从体认视角讨论量词“把”的三种形式及其计量对象的演变机制。因此,为了对“把”字量词义项及其计量对象的演变过程有更深入的了解,本研究将基于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从历时角度,对量词“把”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从体认角度揭示其中的演变机制。

1 体认语言学的基本观点

语言研究经历了“本体”“认知”以及“人本”三大转向后,认知语言学应运而生。不同于“关门打言论”和“语言自治论”,认知语言学以体验哲学为基础,强调人与客观世界间的互动,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源于前者对后者的体验,同时,人通过体验实现对语言的生成和识解。因此,认知语言学强调了语言的体认性、象似性、理据性等特征(王寅,2005),突显了哲学的第四次转向即后现代哲学中的人本思想(王寅,2012)。

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ECL)是对认知语言学发展和本土化的结果,其中,“体”为“互动体验”,“认”为“认知加工”,“认”由“体”决定,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辩证(王寅,2020)。其核心原则是“现实—认知—语言”,也有学者提出将其改为“现实↔体认/体认者↔语言”(覃修桂等,2021;张克定,2019)。因此,体认语言学着重于体认,强调心智和语言的体验性,突出人在连接语言和世界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语言和心智是基于人对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形成的(王寅,2015),反映了后现代哲学中的体验人本观(王寅,2014)。由此观之,体认语言学揭示了语言的体认性,强调从人本角度分析语言现象(王寅,2014)。

自“体认语言学”提出以来,已有学者对汉语修辞、成语和词汇变迁(刘玉梅,2020;魏在江,2019;赵永峰,2019),以及英语空间词和语法教学(刘玉梅等,2021;王寅等,2019)等语言现象中的体认机制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再次证明了语言的体认性,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表明了身体体验和认知加工在语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此外,“词类的转换与体认观有关”(王寅,2020: 304),这为本文从体认角度研究汉语量词“把”的词性演变过程提供了可能性。

2 基于语料库的数据统计及分析

2.1 研究问题

该部分基于语料库的数据统计及分析拟回答以下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把”的量词义项是如何形成的?

第二,量词“把”的计量范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2.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用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采用语料库检索和人工筛选及标注的方式。首先,对含有“把”字的古汉语语料进行检索和整理,从不同时期对“把”的用法进行分类,以期为量词“把”的演

变研究奠定基础。然后,检索出含有量词“把”的现代汉语语料,并结合含有量词“把”的古汉语语料,呈现量词“把”的计量范围的变化情况,以期说明“把”量词义项的形成过程。

2.3 研究结果

2.3.1 古汉语中“把”字量词词性的演变

检索发现,在 CCL 古汉语语料库中,与“把”字有关的语料约为 60 000 条,时间跨度为春秋至民国,出处包括史书、小说、唐诗等,“把”字的词性包含动词、介词、名词、量词和助词。随后,本研究对语料中的“把”字进行词性标注,以期对“把”字的词性分布情况有个初步了解,所得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古汉语中“把”字词性分布

词性	次数	百分比
介词	46518	71.93%
动词	7827	13.04%
量词	5403	9.01%
名词	3363	5.61%
助词	252	0.42%

从表 1 可知,“把”字五种词性的出现次数由高及低依次为介词>动词>量词>名词>助词。介词词性出现 46518 次,所占百分比高达 71.93%,动词、量词和名词次之,分别出现过 7,827、5,403 和 3,363 次,而助词词性出现次数则低至 252 次,仅占 0.42%。对语料语体进一步分析后发现,“把”字虽以介词形式出现次数最多,但相关语料多出自明清或民国小说;其动词、量词和名词形式虽出现次数较少,但在史论、通典、小说等文体中都有涉及,且出现时间也不晚;助词形式则出现最少,且也多出自明清或民国小说中。

为更好地了解“把”字量词词性的演变过程,本研究对所得语料中“把”字不同词性出现时间及含义进行了分析,所得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古汉语中不同时期“把”字的词性及意义

春秋/战国	动词	持有;掌控;握住、拿着
	名词	一手所握的大小
西汉/东汉	动词	持有;掌控;握着、拿着
	名词	一手所握的大小
	量词	一手所握的量,计量同类固体实物合成的整体
六朝	动词	持有;掌控;握住、拿着
	名词	一手所握的大小;一手所握扎成小束的东西
	量词	一手所握的量,计量同类固体实物合成的整体

隋/唐/五代	动词	持有;掌控;握住、拿着
	名词	一手所握的大小;柄部;一手所握扎成小束的东西
	量词	一手所握的量,计量同类固体实物合成的整体
	介词	表处置
宋	动词	持有;掌控;握住、拿着;看守
	名词	一手所握的大小;柄部;一手所握扎成小束的东西
	量词	一手所握的量,计量同类固体/液体实物合成的整体;计量有柄之物;计量动作
	介词	表处置、致使
元	动词	持有;掌控;握住、拿着;看守
	名词	一手所握的大小;柄部;一手所握扎成小束的东西
	量词	一手所握的量,计量同类固体/液体实物合成的整体;计量有/无柄之物;计量动作
	介词	表处置、致使
	助词	表示概数
明/清/民国	动词	持有;掌控;握住、拿着;看守
	名词	一手所握的大小;柄部;一手所握扎成小束的东西
	量词	一手所握的量,计量同类固体/液体实物合成的整体/非实物整体;计量有/无柄/具有抽象意义之物;计量动作
	介词	表处置、致使
	助词	表示概数

从表 2 可知,在所得语料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把”字的动词和名词义项便已出现,此时的动词“把”主要含持握、掌控之义,名词“把”则表示一手所握之大小,含丈量、计量之义。随后,这两种形式的“把”又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其动词义新增了看守、守卫等义,名词义则增加了器物柄部和扎成小束的东西之义。量词“把”出现的时间则略后于前两种形式,它以集合量词的形式首次出现于西汉时期,后于宋代获得了个体量词和动量词形式。介词和助词则分别出现于六朝和元代,前者表处置和致使义,后者表概数义。

由此可知,量词“把”具有集合量词、个体量词和动量词三种形式,且计量范围各有不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计量对象也在不断增加,接下来,本研究将对这些变化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集合量词“把”初时仅计量同类固体实物的集合,后又表示液体实物和非实物。

表 3 古汉语中集合量词“把”计量对象的变化

时期	计量对象	示例
西汉	扁条状或颗粒状固体实物	绒毛、蒿叶、白盐、豆子
宋代	液体实物	泪、汗、鼻涕、水
明代	非实物	年纪、力气

据表 3 可知,集合量词“把”最初出现于西汉时期,其计量范围的变化主要发生于宋代和明代。

形成初期,该形式主要用于计量毛草类扁条状或是盐豆类颗粒状的实物,这些事物相对较小,一把所握数量繁多不便计数,于是使用“一把”作为对一握所得此类固体实物的计量。至宋代,集合量词“把”开始被用于对一些液体实物的计量,如眼泪、汗水等。虽此类实物可被触摸,但却无法向固体实物一样被一把握在手里,由此观之,“把”的计量对象开始虚化。自明代,其计量对象进一步被虚化,一些非实物的事物,如年纪、力气等也被纳入了它的计量范围。

其次,个体量词“把”的计量对象也在不断增加,从最初的有柄事物到之后的无柄事物,再到与一些词汇形成固定结构以表示抽象意义。

表 4 古汉语中个体量词“把”计量对象的变化

时期	计量对象	示例
宋代	有柄实物	斧头、扇子、刀、弓
元代	无柄实物	椅子
明代	具有抽象意义的事物	好手、交椅

从上表可知,个体量词“把”的计量对象也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个体量词“把”出现的最早语料源自宋代,主要计量带柄的事物,如斧子、扇子、刀等。与集合量词“把”的计量对象相比,个体量词“把”的计量对象相对大些,一般“一把”为“一个”。至元代,其计量对象新增了椅子等事物,这类事物虽无把手但仍有一关键部位可被手把控。明清时期,个体量词“把”又与“好手”“交椅”等具有抽象意义的事物连用形成“序数词+把+名词(交椅/好手)”的结构,表示权力和能力。

动量词“把”源于宋代,主要用于计量与抓、握类手部动作有关的动词。

表 5 古汉语中动量词“把”计量对象的变化

时期	计量对象
宋代	揪
元代	扯、揪、拿
明代	抱、扭、按等

从表 5 可知,动量词“把”的使用范围经历了由少到多的阶段。“把”字的动量词形式始于宋代,但在所得宋代时期的语料中,该类用法出现频率极少,仅有“揪”一例。至元代,动量词“把”的使用次数有所增加,但多以“扯”“揪”“拿”作为其计量的动作。自明代开始,动量词“把”的计量对象又增加了“抱”“扭”“按”等动作。

2.3.2 现代汉语中的量词“把”的使用

经检索,在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含“把”字的语料共约 510,000 条,其中,量词“把”出现的语料约 20,000 条,时间跨度包含当代和现代,体裁包括口语、报刊、小说等。随后,本研究对语料中的量词“把”进行了分类标注,对三种形式的量词“把”的分布情况有了初步了解,所得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现代汉语中量词“把”的类别分布

类别	次数	百分比
动量词	5,455	27.27%
个体量词	10,687	53.44%
集合量词	3,858	19.29%

不难看出,量词“把”的三类形式出现频次从高到低依次为个体量词>动量词>集合量词。其中,

个体量词出现频次高达 10,687 次,所占比例为 53.44%。动量词和集合量词分别出现了 5,455 次和 3,858 次,占比为 27.27%和 19.29%。由此观之,虽然“把”的集合量词形式在古汉语中是最早出现的,但其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频率却是最低的;此外,在现代汉语中,个体量词“把”成为最常用的,动量词“把”则次之。

为了解现代汉语中量词“把”的变化情况,我们进一步研究了与之搭配的名词和动词,所得结果如表 7。

表 7 现代汉语中量词“把”计量对象的变化

量词形式	计量对象
集合量词	土、花生、珠宝、鲜花、胡子、糖、硬币、情感、劲、汗等
个体量词	枪、手术刀、双刃剑、雨伞、拖把、钥匙、椅子、交椅、手等
动量词	揪、抓、夺、抱、推、拉、帮、赌、捞、挥霍、年轻、诙谐等

表 7 虽只列出了一小部分计量对象,但也不难看出,在保留其原有计量对象的同时,三种形式下的量词“把”的计量范围都再一次被扩大。集合量词“把”新增了“鲜花”“硬币”等固态实物,也增加了“情感”和“劲”等非实物作为其新的计量对象。个体量词“把”在增加“枪”“拖把”等新计量对象的同时,还衍生出了新的用法,如运用“序数词/数次+把+手”的结构表示权力或职务的等级。动量词“把”则新增了一些抽象的计量对象,如帮、赌、捞、年轻等。

3 讨论

意义和概念结构的生成过程基于人对世界的“体”和“认”。人通过知觉、触觉等感官体验感知世界,并在这样的主客体互动中完成认知加工,从而在脑海中形成相应的意义和概念结构。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事物/事件的体认越来越丰富,知识积淀越来越深厚,知识模块越来越多,这就需要对概念进行抽象;在不断抽象的过程中,便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概括性更强的抽象表达。该过程则是在多重互动的体认过程中达成的。

3.1 量词“把”词性演变的体认机制

研究表明,量词“把”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认知主体通过感官与外部事件的多重互动体验,基于相邻关系的转喻机制,经过心智的认知加工,不断改变“把”的概念结构,最终实现“把”字动词义向量词义的转变,其体认过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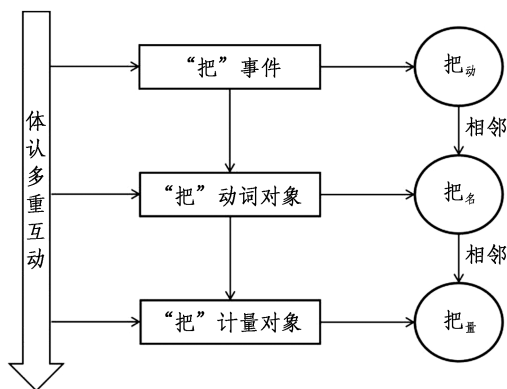


图 1 多重体认互动作用下基于常规关系的转喻机制

图1展示了多重体认互动下,量词“把”演变过程的转喻机制。但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量词“把”的不同形式,其具体的演变过程是有所差异的,接下来,本研究将分别对不同形式的量词“把”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详细讨论如下。

本研究发现“把”字的集合量词形式源于“把”的动词义和名词义,其演变过程大致可表示为:动词义&名词义→集合量词义。基于语料库统计研究结果显示,春秋时期,“把”字便衍生出了名词形式,且暗含丈量之义,如:

(1)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战国《孟子》)

例(1)的“把”为名词,意为“一手所握的粗细”,指的是“一两把粗的桐树、梓树”。至西汉,“把”字首次被赋予量词词性,且为集合量词,用于表示一手所握事物的数量,如:

(2) 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飞不为高下。(西汉《新序》)

(3) 米里著蒿叶一把,白盐一把……(六朝《齐民要术》)

(4) 昔有一猕猴持一把豆……(六朝《百喻经》)

在以上例句中,量词“把”主要用于计量毛草类扁条状或盐豆类颗粒状的固态实物整体。在此演变过程中,动词“把”意为“用手握住”,名词“把”意为“一手所握的大小”,集合量词“把”则表示“对一手所握的事物的计量”。

结合图1可知,集合量词“把”概念的形成是主客体间不断互动致使“把”字概念结构不断改变的结果。主客体间的首次互动使得人脑海中形成动词“把”这一概念。认知主体通过身体感官多次对现实中的“把花”“把酒”“把政”等各类“把”事件进行体验感知,感受到“把花”便是握着花,“把酒”便是握着酒杯,“把政”便是掌控政权,从而形成对“把”动作的认知,理解其“握着、控制”之意,并生成相应的概念结构。主客体的再一次互动则增加了“把”的名词义。认知主体在多次用手丈量事物大小后,发现有些事物可被一只手或两只手握住,如例(1)中的“拱把之桐梓”。因此,为了方便描述,认知主体以部分代部分的方式,选用事件中与所丈量事物最接近的且可表示“用手握住”之意的动作“把”作为对事物大小的丈量。于是,“把”字拥有了名词义,表“一手所握的大小”,人脑海中也形成了“把”字新的意义和概念结构。最后,主客体间的再互动形成了“把”的集合量词义。当认知主体手里握着一堆豆子类圆形物品或蒿叶类尖细物品时,他发现这些事物都比较小且量多不易计数,同时,他也意识到,此时这些事物的量就等于他一手所握的量。基于此体认基础以及“把”已拥有的“一手所握”和“丈量”之意,认知主体将此二者融合,以部分代部分的转喻方式用动作代指计量,形成了集合量词“把”的概念,并用其表示对一手所握的体积小且数量多的同类事物整体的计量。

如前文所述,个体量词“把”最初是以计量带柄的事物出现的。基于语料库的研究结果表明,于隋唐时期,名词“把”便新增了“器物柄部”之义,如:

(5) 邨中又有童谣曰:“金作扫帚玉作把,净扫殿屋迎西家。”(《隋书》)

例(5)中的“把”表示扫帚的柄部,此时的“把”具有了表示柄部的名词义。然后再次经过演变,于宋代,个体量词“把”得以形成,如:

(6) 宋是我一时见他不是话头,却好一把劈柴斧头在我脚边……(南宋《话本选集1》)

(7) 又进太皇后白玉香珀扇柄儿四把……(南宋《武林旧事》)

例(6)和(7)中,量词“把”分别用于计量斧头和扇柄,此类事物多为带柄之物。因此,计量有柄事物的个体量词“把”的演变过程可表示为:动词义→名词义→个体量词义(有柄事物),其中,动词

义为“用手握住”,名词义为“事物的柄部”,个体量词义则为“计量带柄事物”。

如图1所示,个体量词“把”概念的产生也经历了多重体认互动的过程。与集合量词“把”相同的是,在首次体认互动中,认知主体形成动词“把”的概念结构。而不同的是,在第二重互动中,在对“握住或拿着斧头、扇子等”事件的体认过程中,认知主体发现这些事物末端都有一个单独且突出的部位专供手握住以便使用,如斧头末端的圆柱体部位,于是认知主体通过认知加工,以部分代部分的转喻方式,用与之最相邻的手部动作“把”来称呼事物的这一部位,从而赋予了“把”新的名词义。同时,由于认知主体多以自我为中心,根据自身体验认识世界(王寅,2020),因此,为了称量这类事物,基于相邻关系,认知主体以最靠近自身身体的部位为该物体的突出部分,用其名称来作为计量单位。至此,“把”被赋予了个体量词属性,用于计量带柄事物。

研究表明,自元代开始,除了计量带柄事物外,个体量词“把”还可以计量无柄事物,如:

(8) 扯一把椅子拿过来……(元《元代话本选集》)

(9)……拿了一把尺子和一张纸……(当代《世界100位首富人物发迹史》)

例(8)和(9)中,椅子、尺子这类事物虽无把,但都有关键部位作为着力点用于抓取。此种情况下的“把”字演变过程可表示为:动词义→个体量词义(无柄事物)。

首次互动形成“把”动词概念结构的过程与前两种情形相同,此处不再赘述。与前两种情形不同的是,这一过程中,并未经历“把”动词义转换为名词义这一步。在脑海中形成动词“把”的概念结构后,认知主体再一次与外部世界进行了互动。认知主体在体验“抓住椅子、尺子等无柄事物”事件时,发现它们虽无明显柄部,但都有一处是可以且便于被手握住的,如椅子的扶手处、尺子的尺身等。且通过搬运椅子、拿取尺子这些事件,认知主体认识到通过握住以上部位便可以把控这些事物。因此,认知主体通过认知加工,以部分代部分的转喻方式,选用与该事物邻近且含“用手握住、掌控”之意的“把”以计量该类事物,直接赋予了“把”计量某些无柄事物的功能。

此外,研究表明,动量词“把”始于宋代,主要用于计量与手部相关的动作,如:

(10)……把小娘子衣裳一把揪住……(宋《话本选集1》)

(11)兴哥不忿,一把扯他袖子要搜。(元《元代话本选集》)

(12)胜爷过去一把拉住老剑客……(清《三侠剑》)

以上三例中,“揪”“扯”“拉”类动作都包括抓、握之义。本研究认为动量词“把”的演变过程为:动词义→动量词义。

结合图1,虽动量词“把”的产生过程未经由动词义向名词义转变这一步,但其量词义仍是在主客体的多重互动下,基于相邻关系而形成的。动词“把”的概念结构形成过程不再赘述。再次与客观世界进行互动体验时,认知主体发现,一般情况下,在其做出“抓”“扯”“揪”等动作时,手都会与受事的某一部位接触,并做出类似于抓、握状的动作,以达到控制受事的目的,而“把”的动词义项既包含“用手握住”之意,也有“控制、掌握”之意。基于此,认知主体利用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方式,选用这些事件中最突出且共享的一点作为对这类动作的计量,“把”的动量词形式由此而生。

综上所述,量词“把”的生成是认知主体在体认的多重互动作用下依靠反映相邻性的转喻机制演变而来的。

3.2 量词“把”的计量范围演变的体认机制

除已提到的词性演变之外,研究结果还表明,三种形式下的量词“把”的计量范围都在不断扩

大。究其原因,可分为两种:一是由于时代的发展,一些新兴事物出现,且这些事物根据其性质、特征等可被划入一些原有事物的范畴;二则是因为新增了一些抽象化的计量对象。如:

(13)老苍头道:“老汉一把年纪,怎么说谎?”(明《今古奇观(上)》)

(14)小女孩接过这一把硬币……(当代《读者》)

(15)……霍金士也一举登上美国食品加工业第一把交椅。(当代《市场报》)

(16)乔尼下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弄到一把枪。(当代《地球沙场》)

(17)七大姑八大姨来帮我照应一把。(当代《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上例中,例(13)(14)、例(15)(16)和例(17)分别是“把”在集合量词、个体量词和动量词形式下的计量对象。其中,“硬币”和“枪”属于第一类,它们都是具体事物,因其某一特征与原有的计量对象有相同之处,而被划入计量范畴。而其余的“年纪”“交椅”“照应”则属于第二类,它们是抽象事物,属于被抽象化的计量对象。第一类比较容易理解;第二类体现了计量范围及方式的演变。这里我们基于语言体认观重点对第二类进行分析。

首先,以例(13)中“一把年纪”为例。在认知主体的脑海中,已构建了集合量词“把”的概念,认知主体已认识该形式下的“把”可用于计量一手所握的一堆细长事物,因此,用“一把白胡子”表达许多白胡子。而认知主体根据自身经历或对别人的观察可知,一般情况下,年纪大的人会拥有白胡子,白胡子可作为年纪的象征。因此,基于整体和部分的相邻关系,经认知加工,认知主体在脑海中形成了“年纪=白胡子”的概念结构,故而,用于计量具体对象“白胡子”的量词“把”,也可用于计量抽象对象“年纪”,形成“一把年纪”的表达,用于表示年龄大。

其次,以例(15)中“第一把交椅”为例。“交椅”源于马扎,行军打仗、打猎时供地位高者使用。因此,经过认知加工,认知主体以部分代部分的转喻方式,用“交椅”代表权力。此外,由于排座位时重要的人通常位于第一个座位,因此,能坐在第一把交椅上的人就是权力最大的人。于是,基于此体认过程和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方式,认知主体用“第一把交椅”来指代权力最大的人。因此,虽然“交椅”被抽象化为“权力”的表征,但仍可以被个体量词“把”所计量。

再次,以例(17)中“照应一把”为例。“把”的动量词形式最初是用以计量手部动作为主,主要用于计量含有抓、握义的动作,此类知识已在动量词“把”的概念结构形成过程中得以构建,因此,“拉一把”的表达得以生成。最初,“拉一把”仅有具体义,当拉起一个摔倒或将从高处掉下的人时,或是当从高处去拉一个人以帮助他向上走时,都可被称为“拉一把”。而以上情形都是帮助他人的一种表现,于是,基于“拉一把”和“提供帮助”事件间部分和整体关系,“拉一把”便有了“帮助”这一抽象义。“照应”一词虽未明确地表示手部动作,但也有伸出援手、帮助之意。因此,认知主体在对“拉某人一把”和“照应某人”事件的体认过程中,体会到了二者间的相邻关系,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作可视为“照应”事件的一种表现。所以,基于此相邻关系,“把”也可被用于计量“照应”这一动作,于是,便有了“照应一把”这一表达。

综上所述,量词“把”计量对象的抽象化也是基于主客体间的多重互动的。在该过程中,认知主体在已有对量词“把”计量对象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对客观世界中的其他抽象事物进行身体体验和感知,根据这些抽象计量对象与其原有的具体计量对象间的相邻关系,将这些抽象事物也纳入了量词“把”的计量范围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量词“把”的计量对象抽象化是在多重体认互动作用下基于相邻关系的转喻机制演变而来。

4 结语

本研究结合语料库,在语言体认观的指导下,分别对“把”的集合量词、个体量词和动量词这三种形式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历时分析。调查分析发现,三种形式的量词“把”出现时间和计量对象都有所差异,这为我们探究量词“把”的演变机制奠定了分类基础。其中,集合量词“把”出现最早,其计量对象主要包括固态实物、液态实物或情感类非实物;个体量词和动量词形式出现稍晚,前者用于计量有/无柄的实物以及具有抽象意义的事物,后者则用于计量表示抓、握类手部动作的具体动词以及一些抽象动词。

在此基础上,论文对量词“把”的词义和计量范围演变的体认机制进行了阐释。量词“把”词义演变的体认机制的运作方式主要体现为:主客体间的多重互动贯穿于量词“把”的意义和概念的生成过程。在“把”字量词义的生成过程中,认知主体不断与外部世界中的各类“把”事件、动作对象和计量对象进行互动体验,并基于相邻关系的转喻机制,经过认知加工,分别生成“把”的动词义、名词义和量词义,最终使“把”字概念结构完成“动词义 & 名词义→集合量词义”“动词义→名词义→个体量词(有柄事物)”“动词义→个体量词(无柄事物)”和“动词义→动量词”的转换过程。此外,由对量词“把”计量对象抽象化成因的分析可知,量词“把”计量对象的抽象化也是基于主客体间的多重互动的。基于对量词“把”已有计量对象的认识以及对客观世界中的其他抽象事物的身体体验和感知,认知主体发现二者间相邻性,在此基础上,实现量词“把”计量对象的抽象化。

该研究结合语料库,为量词“把”的历时研究提供实证依据,并基于语言体认观对量词“把”的演变机制进行了分析,有望为量词的生成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Aikhenvald, A. Y. 2000.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 [M]. Oxford: OUP.
- Cheng, L. S. & R. Sybesma. 2005. Classifiers in four varieties of Chinese [G]// Cinque, G. & R. S. Kayn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Oxford: OUP.
- Craig, C. 1992. Classifiers in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G]// M. Fortescue, P. Harder & L. Kristoffersen. *Layered Structure and Reference in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Zhang, H. 2007. Numeral Classifiers in Mandarin Chinese [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 43-59.
- 步连增. 2011. 汉语名量词起源再探[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89-96.
- 陈香兰,禹杭. 2018. 基于历时语料库的量词“套”的演变及转喻机制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3): 26-32.
- 高亚楠,郑氏永幸. 2018. 汉语跨类量词的历史成因与哲学逻辑[J]. 汉语学报(2): 14-20+95.
- 金桂桃. 2007. 动量词“把”的产生、发展及相关问题[J].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7): 20-22.
- 李春梅. 2012. 汉语名量词“把”的发展演变[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3): 87-90.
- 刘玉梅. 2020. 基于体认识解机制的汉语修辞格分类研究[J]. 外语教学(6): 25-31.
- 刘玉梅,王敬媛. 2021.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 in 空间关系中的“界限”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 24-32+158-159.
- 刘子平. 2013. 汉语量词大词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牛保义. 2010. 心智模拟概念化——量词“把”的语义概念化研究[J]. 外语教学(5): 1-5+14.
- 覃修桂,帖伊. 2021. 体验的多维性与体认原则[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1): 48-56+159.
- 任超奇. 2006. 新华汉语词典[M]. 武汉: 崇文书局.

- 王艳滨. 2016. 现代汉语借用动量词的转喻类型研究[J]. 外语教学(3): 30-34.
- 王寅. 2005. 事件域认知模型及其解释力[J]. 现代外语(1): 17-26.
- 王寅. 2012. 指称论新观: 命名转喻论——从摹状论、因果论到转喻论[J]. 外语教学(6): 1-5.
- 王寅. 2014.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J]. 外国语文(6): 61-67.
- 王寅. 2015. 体认一元观: 理论探索与应用价值——心智哲学的新思考[J]. 中国外语(2): 24-31.
- 王寅. 2020. 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寅, 王天翼. 2019. 基于体认语言学的英语语法教学[J]. 外语界(1): 44-52.
- 魏在江. 2019. 体认语言学视域下汉语成语的转喻机制研究[J]. 中国外语(6): 26-33.
- 邢福义. 1991. 现代汉语[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张克定. 2019. 体认原则及体认者、现实和语言的相互关系[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6): 71-80+158.
- 张志公等. 1956. 语法和语法教学——介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赵永峰. 2019. 体认语言学视阈下的语言主体间性研究——以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变迁为例[J]. 中国外语(6): 50-56.
- 宗守云. 2009. 论集合量词“把”对名词性成分选择的范畴化过程[J]. 语文研究(4): 22-26.

The Meaning Extension of Classifier “*ba*”: The Embodied-Cognitive Perspective

LIAO Qiaoyun LI Ruixiu

Abstract: Based on the CCL corpus, this study makes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ree forms of classifier “*ba*”, that is, collective classifier, individual classifier and verbal classifi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ree forms of the classifiers “*ba*” a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occurrence time and measurement objects. Besides, the measurement ranges of the three forms have been expanded and the measured object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abstract. What is more, from the embodied-cognitive perspective, it is found that the multileve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gnitive subject and the world works throughout the generative process of the meaning and concept, and that because of the multilevel embodied-cognitive interaction,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classifier “*ba*” have been extended for several times. In this way, the meaning extension processes of the three forms of classifier “*ba*”, that is, “verbal and noun meaning→collective classifier meaning”, “verbal meaning→noun meaning→individual classifier meaning (things with handle)”, “verbal meaning→individual classifier meaning (things without handle)” and “verbal meaning→verbal classifier meaning”, have been completed. It is concluded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ultilevel embodied-cognitive interaction, the generation of classifier “*ba*” and the abstraction of its measured objects have been realized based on the metonymic mechanism represented as the relationship of proximity.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word meaning evolution based on the embodied-cognitive view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Key words: classifier “*ba*”; multilevel embodied-cognitive interaction; metonymic mechanism

责任编辑:冯革